

目 录

旧州读书会抗日救亡活动的片断·····	石天录 (1)
丹寨县城区小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彭玉昆 (5)
施秉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	李鹤皋 (8)
我亲历的抗日救亡活动·····	袁德齐 遗稿 (11)
抗战期间的三穗县民众教育馆·····	谢治平 (24)
日军铁蹄进丹寨·····	陈光如 (29)
“九一三”日机轰炸丹寨惨案·····	丁应星 (34)
一个炸弹坑 ——“黔南事变”片断·····	丁应星 (37)
旧州飞机场修建情况的回忆·····	任道安 (39)
民国初年邛水县学校革新·····	修成、郑厚华 (44)
解放前的丹寨女子小学校·····	刘荣之 (53)
解放前的雷山中学·····	喜 农 (56)
解放战争时期贵州大学学运概述·····	纪 勋 (62)
丹寨铸铁史话·····	文朝汉 (81)
四十年代丹寨铁器手工制造业·····	王其井 (85)
长吉纺织合作社·····	王国华 (90)
解放前麻江的邮政事业·····	向景云 (93)
镇远新大桥修建始末·····	田静波 遗稿 (96)

矢志不渝跟党走

——忆苗族爱国人士吴通明同志……吴实、张玉环、惠世如(98)

旧黄平中学校长余介侯……………彭冠杰 (107)

创建黄平中学的杨正凡先生……………彭冠杰 (112)

欧阳朝相生平事略……………钟光尧 (117)

冯玉祥将军在镇远……………田静波 遗稿 (121)

吴传声保卫榕江城……………周元湘 (124)

孙西伯传略……………孙位三、彦之 (127)

我们所知道的刘伯龙暴行……………雷震、彭冠杰 (138)

施秉县紫荆镇的土改重点工作……………杨祖芳 (150)

我参加土改工作的回忆……………袁德齐 遗稿 (164)

土改运动中的草芦坪团支部……………吴正 (171)

辛亥革命在榕江的酝酿和成功……………王献奇 遗稿 (175)

辛亥革命在黎平……………蒋梅村 遗稿 (177)

镇远县民打百货厘金局……………谢协成 遗稿 (179)

丙寅年大饥荒散记……………李光厚 (181)

旧州读书会抗日救亡活动的片断

石天录 口述 黄平县政协文史组整理

一九三七年春，我和在旧州中学第二期同班毕业的刘明辉、宋光祖等同学一起考入贵州省立贵阳中学高中部第十四期读书（那时是春季招生）。周开铨是高年级（即第十二期）的同学。抗战爆发后，国难深重，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周开铨和我都参加了学校的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贵阳市大十字第二次被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后，市内各校都移住郊区，我们学校迁移乌当，高中部设在该区后坝。这时，抗日烽火愈烧愈烈，各学校的抗日救亡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歌咏、话剧、绘画三个队。我和周开铨都参加了歌咏队和话剧队，多次参加演出活动，并参加了贵阳筑光音乐会的演出。

是年寒假期间，我们回到旧州，又与旧州中、小学的部分教师组织临时抗日救亡宣传队，到旧州、上塘、浪洞、平溪等乡镇进行宣传演出。一九三九年春，宣传队活动结束后，我们又发起组织读书会，并商定：周开铨仍回贵阳继续读书，我作为休学留在旧州负责读书会的工作。那时我的正式

工作是旧州一小教师，担任五年级级任教师（即现在的班主任），并在旧州三小兼音乐课。一小的校长李正才对读书会的活动很支持。我记得当时参加读书会的成员有：周开桢（男、旧州一小事务主任，解放后原在黎平食品公司工作，已退休）、陈淑连（女、解放后曾在省新华书店工作）、龚庆华（女）、石正翠（女）等教师；旧州中学的胡文鼎、周文珍、韩世昌、刘隆真等学生。旧州街上的华清明，他虽未加入读书会，却主动趁经商之便，为我们做联络工作，我们往往借他到贵阳的机会与周开铨联系，传递书刊和信息（我的直接联系人只周开铨一人）。

读书会活动的内容：一是阅读进步书刊。主要的读物有：《新华日报》、《大众哲学》（艾思奇著）以及当时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著作，包括翻译的文学名著《母亲》、《铁流》等。这些书刊多由华清明从贵阳周开铨处带回交给我们。一般是每星期六以轮流到各会员家吃“转转饭”的方式，把这些书刊分发大家交换阅读，同时交谈前段读书的心得体会，并交流一些时事消息。大家都感到新鲜有趣，打开了眼界，对时局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增添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二是组织话剧公演，举行抗日救亡歌曲演唱大会，宣传抗日救亡、保家卫国、抗战必胜等思想。一九三九年春，开学不久我们就搞了一次话剧演出。不仅读书会的成员，连学校的其他师生都参加了，还扩大到街道群众，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群众性公演。其中有一出剧是表演一个抗日游击队长受伤后，得到群众掩护的情景，由我扮演游击队长，陈淑连演游击队员。抗日歌曲的大合唱，我记得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等一组歌曲，十分鼓舞人心，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三九年五月，周开铨由贵阳回来，决定由他继续领导读书会活动。我上贵阳找周开基（开铨的四哥），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边远农村工作团”做救亡宣传工作。我们一路经过锦屏、天柱、剑河、台江等县，最后到雷山结束。这个工作团虽然名义上归国民党政府领导，但是，通过借演出话剧、举行抗日歌曲演唱会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起到了动员群众，教育人民的作用。

同年十月十日，我又回到贵阳，借住在福德街常和笙家（即原筑光音乐会旧址），遇见了周开铨、周开桢（开铨的三哥）、田维智（原镇远师范学生）、陈淑连等，交谈中才知道旧州的读书会有了发展，人员增多了（在我离开旧州后，田维智也参加了读书会），影响也扩大了。于是，反动当局饬令新编二八师（师长刘伯龙）驻旧州的八四团将田维智、陈淑连、龚庆华等赶出旧州，他们只好到贵阳来暂避。

随后，经江竹一（贵阳士绅，曾任旧州分县长）介绍，我被分在贵阳粮政局第一仓库工作，陈淑连、龚庆华二人在红十字会工作。田维智当时找不到工作。周开铨因受到反动当局的注意，继续留在贵阳已不安全，故于同年十一月由我送他从龙洞堡出走无锡。我们在旧州搞读书会的活动也就中断了。

一九四〇年底，我回到黄平，参加修筑旧州飞机场民工大队部（后改为民工总队）工作，任“粮秣会计”。大队部设在旧州文峰寨三小内。一九四一年三、四月间，刘伯龙布置在黄平进行了一次大搜捕，我也在民工总队部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田维智、王书田（是由周开铨发展加入读书会

的）、常学华（常和笙的女儿）、张寿卿（女）、陈淑莲（女）、龚庆华（女）、胡文鼎、韩世昌、周文珍等多人。胡文鼎、韩世昌、周文珍等被申斥后释放，未被关押。我们在八四团团部关押几天（约一个星期），就被转移到黄平县监狱，田维智被关在内监，常学华、张寿卿、龚庆华三人被关在女监，我和其余的男同志被关押在外监。

几个女青年是由常和笙找关系保释的，我被关押了三个月左右，我父亲和叔父（石玉昌）等托当时黄平中学校长余介侯假称我和他是师生关系，向刘伯龙保释的（刘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时，余是教官）。我出狱后，才知道田维智和王书田已被刘伯龙杀害一个多月了。我们这次被捕，直到解放后“三反”运动中，才弄清是由一个国民党县政府的职员罗××向其主子告密而造成的。

韶光易逝，从那时算起，已经四十多年了。往事难以忘怀，特记述此文，聊表对田维智、王书田等先烈的怀念之情。

选自《黄平文史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油印稿），刊载时有删节。

丹寨县城区小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彭 玉 昆

丹寨小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首先由朱伯铃、李文江、黎德章等人率领学生开展起来的。

朱伯铃是东北松花江畔的人。“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以后，他家破人亡，亲人离散，被迫只身逃难，于一九三五年到达丹寨，任丹寨县卫生所第一任所长。

当时丹寨卫生所设在与城区男子小学校相连的孔庙内，孔庙前面的坝子是我们学生课外活动的场地。因此，朱伯铃有机会与学生们接触，经常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讲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的暴行和东北抗日联军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故事。

后来，学校请朱所长向全校师生作一次日军侵华暴行的演讲，并邀请女校的同学参加。男女两校的师生，听了朱所长的讲话以后，女校的同学，冲破禁区，与男校的同学联合行动，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李文江是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丹寨男子两级小学校的语文教师。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常教育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大家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每逢赶场天，他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亡的道

理，唤起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去。

黎德章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丹寨男子小学的教员、校长，也是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他教唱抗日歌曲，导演话剧和活报剧，并把他所搜集到的抗战歌曲介绍给邻近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向我华北进攻的消息传来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摆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丹寨小学生就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做自己能做的工作。

城区男女两校的师生，各组成一个抗日宣传队，每逢赶场天，排成整齐的队伍，扛着校旗，摆上一张方桌，敲锣打鼓，唱抗日歌曲，等群众聚拢后，就由一、二位师生站上方桌，演讲抗日道理，控诉日寇奸淫、烧杀、掳抢的暴行，号召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一致起来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买日货，不卖日货。

城区男女两校还联合演出话剧和活报剧，唱《游击队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记得朱所长与学校师生，根据《流亡三部曲》的内容，编演了一幕话剧，朱所长扮演在枪炮声中与父母妻儿失散的只身逃难者，当他演到只身逃难，唱起“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表演者，均泣不成声，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

募捐队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或课余时间，上街、上门、下乡进行募捐，支援抗日前线。

学校抗日宣传队，发起了一双布鞋捐献运动。每个学生都拿出实际行动，回家要姐姐、妈妈做一双布鞋去慰问前方将士。不到一星期，学生交来的布鞋，就堆满办公室。街道居民，也送来了布鞋，有的还送来了向前方将士的慰问信。

组织学生制作手工艺品义卖。男女校师生还发起每人制作三件工艺品展出义卖活动。这一消息传来，男校的学生，扛着抗日宣传队的旗帜，分别向三苗寨、马颈坳、烧茶等地购买楠竹，搜集倒勾藤。有的群众知道我们买竹子是为了抗日救国，于是纷纷捐献楠竹。回校后，每人一把雕刀，有的刻竹对联，有的刻竹笔筒，有的刻狮子头筷子，有的刻罗汉头筷子，有的用倒勾藤制作别致的自由棍。女校的同学，也开展每人一颗针的刺绣活动。他们利用课余时间，绣信套、手巾、相夹等。后来把工艺品集中男校礼堂，标价义卖，没卖完的，就上门、上机关办公室，找殷实户义卖。同学们讲清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很快就义卖完了。

我们把义卖款、募来的钱、慰问品、慰问信，均交给县抗日救亡运动委员会转交前线作战将士。

丹寨城区小学生，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精神，他们所做的一点工作，也曾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影响是深远的。

（丹寨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施秉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

李 鹤 皋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中国，抗日救国的呼声唤醒了我们年轻的一代。当时在镇远师范就学的十多个施秉学生中，有宋大鸣、邱肇业、陈守业（女）、何天祈、杨胜钊和我等，为加深了解日本侵华事实真象和民族统一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以宋大鸣为主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进步刊物和进步书籍传阅。

一九三九年，我和邱肇业、何天祈进入施秉小学（当时施秉无中学）任教，由我们三人发起在施秉小学组织读书会，吸收学生宋大著、李鹤卿、雷国富、宋大承、张云芝（女）、吴占贵、沈仕俊、周素芳（女）等人参加。先是传阅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多由镇远读书会转来，由何天祈统一保管。随后我们在学校把五、六年级的学生组织起来，白天上课，晚上练习歌咏，排演节目，组织宣传队，在学校和社会上，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我们开始只在城里，后来也到乡下去，如双井、高碑、地坝等地都去搞过化装宣传和演街头话剧。我们的宣传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唱革命的抗日歌曲，以抵制黄色歌声，振奋人们

的精神。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天涯歌女》、《四季歌》等。我们在结队游行的时候，在讲演和演出话剧的开头，都要唱一些革命歌曲，以慷慨激昂的革命歌声吸引听众，宣传群众。

二、化装宣传和讲演。在城里，每逢赶场天，我们分别在十字街、猪市坝，古楼街等处，用大桌子、高板凳当台，进行化装宣传和讲演。有的化装成日本鬼子、汉奸，大部分则化装成工、农、商、学、兵，低年级较大一点的学生也列队出动，手持镰刀、木棒、小三角旗，押着“日本鬼子”、“汉奸”游街示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贩卖日货的奸商”、“抵制日货”、“禁止日货”、“不买、不卖、不用日货”、“全民动员，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等口号。

三、自编自演话剧。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们在玄暗观（现税务局住地）连续演出三个晚上。那时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和打气灯，舞台自己搭，服装道具向民间借。我们先演了按《流亡三部曲》歌词内容编的一组歌剧：一名少女的家乡沦陷了，家人惨遭日本侵略军的杀害，她只身到处流浪，历尽艰辛。悲惨的歌声，淋漓尽致地唱出了她孤苦零丁，无依无靠地流落天涯海角，以卖唱为生的凄凉生活，台下观众都泣不成声。接着演了一出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戏。当我机智勇敢的游击战士押着侵略者和汉奸出台时，台下观众自发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

口号，真是群情激怒，声震山岳。还演了一幕讽刺性的滑稽戏，戏名：“舔肥”，刻画一个势利跋扈之徒“老保”，在弱者面前是“英雄”，在强者面前是狗熊的故事。“老保”正在几个乡下佬和一群小孩中，吹嘘他如何了不起，跑过市外，到过省城，和洋人同桌吃过西餐，抱着漂亮姑娘跳过舞。当他一见到财主、少爷、小姐，马上出现一付献媚奉迎、低三下四的奴才相。而财主们偏要奚落他，叫他用舌头来将一块肥肉上的余血舔干净，他伸出舌头去舔肥肉血迹的狼狈相，引得台下一片笑声。

施秉县城是一个不发达的农村集镇，人口不多，文化落后，社会沉寂。我们几个青年人从镇远回来，通过这一系列的抗日宣传活动，首先在学校出现了新的面貌，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突破了男女分校的鸿沟，增添了新鲜空气，使人们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分子，对于我们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当时的县长杜光武就把我们当成眼中钉，非拔掉不可。宋大鸣不能立足远走他乡，我不得不出走，邱肇业被捕押送贵阳后被暗杀，何天祈一度被关押。尽管如此，我们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已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在故乡的土地上。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施秉这块土地已同全中国一样，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了我们当年的愿望。

（原载《施秉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转载时有删节。）

我亲历的抗日救亡运动

袁德齐（遗稿）文史办整理

编者按：作者袁德齐是原黔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的女儿。早年上海大夏大学学习期间，曾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后因病回黔治疗，以致脱党。贵州解放初期，经党组织教育，重新走上革命道路。本文是她参加救亡运动的亲身经历的记述，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特此刊载，以供研究参考。

我的中学时代，正是军阀混战的岁月，我经常听到亲友和学生们谈论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军伐混战。由于我的父亲袁祖铭在贵州当省长的时间短，人们多半论及他如何勇猛善战，如何团结弟兄取胜，又如何被蒋介石的爪牙唐生智暗杀的事，但也有叹惋，说他胆大失荆州，否则怎有蒋介石的天下。有一次，我在生母的皮箱里，发现父亲在贵阳南厂阅兵时的照片，上面有我父亲的亲笔题诗，我记得第一首是：“十万雄兵渡巫山，一鼓荡平武胜关。逐鹿中原人有份，国权唯赖我争还”。我认为父亲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立志要争还被列强侵犯了的国权，他这个想法是对的。我把他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的形象在无形中影响着我。

一九三一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传到贵阳山城，群情沸腾。我跟随贵州女子师范的同学们涌上街头，通宵达旦地游行示威，次日，又沿街宣传。我们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占我东三省的滔天罪行及蒋介石按兵不动的卖国主义行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在女师（八期）的同学兰运藏、谢绪菱、严金秋、朱世芬、寇述彭和胡有献等的带动下，为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做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三五年的二月间，我在生母王惠琴的支持下，到上海去学习。我在上海大夏大学暑期补习班补课，在秋天就考上大学，在大夏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读书。我一到上海，就遇着两件事：一件是，我偷母亲金首饰支持出外谋生的青年黄承光。他是我母亲的亲戚，叫我二娘。他出外在香港福特汽车公司当工人，遭受到英帝国主义的爪牙毒打后，愤然离开香港到上海找工作。我去上海时，他无职业流浪街头。另一件事，是他带我到上海外滩去玩，我看到黄浦江上停泊着英、法、日、美等外国的货船和军舰。黄承光说：中国工人为生活所迫，给帝国主义当搬运夫，中国早已丧失了海关权。记得那天乘电车过日本租界时，到了一个站口，有两个日本小学生下车，他们突然向我和黄承光吐唾沫，在我来不及对付时，他们开动车子溜走了，我们直气得咬牙跺脚。我初到上海，人地生疏，对帝国主义纵有满腔的怒火，也是孤掌难鸣！于是，我就注意着在大夏同学中找寻爱国志士。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教室里看书，听见两个衣着朴素的女同学在轻声细语，我侧耳静听：“阿比西尼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敢于反抗意帝国主义的侵略，难道我们中华

大同就忍辱下去吗？……”这些话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向他俩走去，握住一个高个子女同学的手，作自我介绍。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那高个子叫项淑贞（向枫），是浙江温州人。我叫她阿贞，矮个子叫周泽芬，江西吉安县人。

阿贞善于做群众工作，当她知道我的英语差时，就主动地帮我补习，使我很快地亲近她。后来，我把黄承光的情况向她介绍以后，她先介绍我们学拉丁语，然后把黄介绍给游击队。我勉励黄承光要立志救国，并为他改名为黄志恒。

（一九四九年他经贵阳带部队去解放云南，现在昆明离休。）

一九三五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很快地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上海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十二月十九日晚饭后，天黑漆漆的，我听见有人大声喊：“我们要收复失地！”“我们去请愿！”话音刚落，阿贞急忙来喊我说：“暨南大学的同学来喊我们去请愿，她当即挽起我的手臂，跟大夏许多同学涌出校门，加入了请愿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到交通大学时，那儿的灯熄了。不过，一路上还联络了许多大学的同学，其中也有光华大学的学生。我们四个人一排，浩浩荡荡，通过原野，行进在漆黑的马路上。黎明时，我们的大队伍已汇集在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前面。同学们不顾途中的的疲惫推出代表纷纷向当局者请愿。上海各界同胞，还派人用好几部卡车送来慰问的食品。第二天有中學生去请愿。这次行动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影响很大，震动了整个上海。这次运动发生后，上海几所大学的学生，组织了自己的上海学联。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人民的

反对。“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发展。我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教育。

一九八〇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专题研究组，曾访问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大夏学生余昕、郭敏、向枫，还函请我参加写回忆录。一九八一年，由上海党史第三期刊出。据当时大夏党支部书记余昕（上海机械局党支部书记，八一年冬患癌症不幸逝世）同志回忆：一九三四年前，大夏大学就有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叫马一行。“一二·九”运动以前，从北京转学到大夏的同学黄尔尊找到了党。组织上把化名叫老张的陈家康介绍给余昕。一九三六年初，余昕和陈训涛先入了党，寒假后刘开基再入党。在陈家康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大夏支部，推余昕任支书。一九三七年张英（黄文荃）、郭敏（原名叫丘叔燕）、袁德齐等入党。大夏大学的学生运动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一九三六年大夏大学的救亡活动，主要是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上海救国会进行活动。我们活动有两条线：男同学是学生救国会，由余昕、张英、陈训涛联系；女同学是妇女救国会，由向枫（原名叫项淑贞）负责联系。我们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

在校内的活动

一是利用“学术研究”的名誉举办“讲座”，内容有：“日本问题”、“国防问题”、“社会发展史”等，讲日本问题，使我知道日本人民中有中国的朋友，他们也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讲国际问题，使我知道列强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是

首先要打倒的主要敌人。我没听社会发展史。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更不明白我的出身与我的关系。我还不知道马列主义只有唯心与唯物两个概念，唯心是不科学的。在学习时事中，有一天，我看到《申报》上登载有施剑乔（女）为父报仇的消息时，对父仇就有了鲜明的态度：蒋介石抗日，我就不报仇；蒋介石不抗日，我就要反对他的政权。

二是“学会”，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史地学会”。余昕是史地系学生，我听过他的宣传，观看过时事挂图。史地学会编写《史地知识》刊物，由吴德让同学主编，蒙史地教授梁园东的支持，同学们喜欢看。

三是“读书会”，由向枫组织起女生的读书会。基本成员五人：吴元成（苏州人，年最长，系孙晓村同志的爱人，现在北京），周泽芬（抗战期中，曾与我到贵阳，我俩在修文中学教过书，现无消息），郭敏（余昕的爱人），她是广东梅县人，项淑贞（向枫，现在上海政协工作）和我。为了便于联系，郭敏把高个子向枫叫“大号”，我的年龄最小叫“五号”（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们五人的合影）。我们五人分别订了报刊杂志，报纸有：《申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立报》，杂志有《世界知识》、《新生活》、《妇女生活》等。我们每周轮流作时事简介，如有特殊事件，就互相讨论。我们在读书会中布置工作。如果要到校外参加什么游行或对外联系，先要作准备，回来后作总结。我们之间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思想上、生活上都紧密团结。我从偏僻的贵州出去，在读书会中，不仅是学习成绩差，而是在政治活动上非常幼稚，干起工作来虽然热忱勇敢，能尽力去执行任务，但是在忙中不冷静，在政治上不